

華夏之學應含「夷」

——評夏含夷《興與象：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》

● 陳嘉禮



《興與象》可視為《古史異觀》的續集，收錄了二十六篇論文，涉及年代自商至漢，討論範圍包括甲骨、金文、簡帛，以及傳世經典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竹書紀年》等，為中國上古史研究帶來更多新的視野。

夏含夷 (Edward L. Shaughnessy)：
《興與象：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》
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)。

《興與象：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》(以下簡稱《興與象》，引用只註頁碼)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夏含夷 (Edward L. Shaughnessy) 的最新中

文論著。夏含夷是著名中國上古史專家，芝加哥大學首位顧立雅講座教授 (Lorraine J. and Herrlee G. Creel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Early China)，曾任同校東亞系系主任。他還曾任知名漢學學刊《古代中國》(*Early China*) 主編，並與英國漢學家魯惟一 (Michael Loewe) 共同主編享有盛譽的《劍橋中國古代史》(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: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.C.*)^①。夏含夷的代表性英文著述包括《西周史料》(*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*)、《孔子之前》(*Before Confucius*)、《古代中國》(*Ancient China*)、《重寫中國古代文獻》(*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*)、《儒道智慧》(*Confucian & Taoist Wisdom*) 等^②，並出版了一部《易經》英譯本^③。他的中文論著包括《溫故知新錄》、《古史異觀》^④；主編中文文集《遠方的時習》和《中國古文字學導

論》^⑤。他在甲骨文、青銅器、竹簡以至古文獻研究等方面均有卓越成就^⑥。

按夏含夷自己的說法，《興與象》可視為《古史異觀》的續集。《興與象》這部文集收錄了二十六篇論文，涉及年代自商至漢，討論範圍包括甲骨、金文、簡帛，以及傳世經典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竹書紀年》等等（〈自序〉，頁1）。全書基本反映夏含夷近年的研究成果，書中收錄的論文都是匠心獨運之作，為中國上古史研究帶來更多新的視野。

夏含夷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時曾研究《周易》。對於《周易》，他曾提出很多獨到的見解。在《興與象》中，他認為「元亨利貞」不是傳統上所說的「四德」，「元亨利貞」是卜筮的術語，又認為《周易》筮法有兩次貞筮（頁20-46）。不論夏氏的結論是否能夠成為定論，從研究方法上看，他不但利用《周易》作內證，又結合《歸藏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尚書》、楚簡、甲骨等證據提出新說，其細緻的文獻學功夫無疑提高其研究的可信程度，這方面是值得中國上古史研究者效仿的。

夏含夷肯定《周易》作為傳世經典的地位，但他不同意《周易》與其他經典一樣，可以「閱讀習慣」來詮釋，因為「易不可為典要」（頁132）。他以「萃」卦為例，說明創造卦爻辭的筮者欣賞某一字的不同意思，在一個卦的不同爻辭裏往往強調某一同源詞的不同方面，而在

《周易》的編寫過程中，各家詮釋者，亦即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區的抄寫者，只能採取一個意義來理解某一個字，那樣，抄寫者就只是按照當時的書寫習慣，利用一個「正確」的字來寫定。所以，夏含夷主張要採取一個不同的詮釋方法（頁120-33）。

夏含夷一直致力利用出土文獻來校勘傳世文獻。例如《歸藏》，其流傳過程非常曲折，似乎東漢以後已經失傳，但晉代郭璞又常直接引用《歸藏》，可到了南宋時代又再次失傳。夏含夷以湖北王家台出土的竹簡為證，肯定《歸藏》至少是真正的先秦文獻（頁106-109）。他又以阜陽漢簡《周易》說明卦爻辭後面都有筮占的術語，與戰國、秦、漢的《日書》相似，並指出類似的術語更見於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（頁112-14）。研究《歸藏》和出土漢簡《周易》有助我們理解古代占筮和貞筮過程，對了解《周易》編纂過程有重要的啟發。

夏含夷對甲骨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在於提出「微細斷代法」，為中國上古年代學的重構提出新的方向^⑦。《興與象》中的甲骨學研究則把視野放到占卜文化上。夏含夷考察到何組卜辭的「鄉」字用法特殊，不但在文獻上有所對應，在《周易》中亦見其相似的用法，指出這是向「鬼神受饗貞筮的祈求」（頁56）。他又延續對《古史異觀》中曾討論過的「由」字的研究，指出「由」是「思」，有「願望」的意思，由此提出周代卜筮的主要目的是

《興與象》中的甲骨學研究把視野放到占卜文化上。夏含夷否定甲骨卜辭有「問問題」的性質，並利用出土與傳世文獻的證據，說明周代占卜的主要目的是祈吉、祈福，對理解古代占卜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啟發。



筆者與夏含夷教授合影

為了求吉，向鬼神表示「心所希望」(頁66)。

夏含夷對中國古代占卜文化的見解至少累積有三十年的功力，縱使他的〈試論周原卜辭由字——兼論周代貞卜之性質〉一文到1989年才在《古文字研究》上發表，但他對「由」字和周代貞卜之性質的見解已早在1983年形成^⑥。他長期考察中國占卜文化的形成，又否定甲骨卜辭有「問問題」的性質，並利用出土與傳世文獻的證據，說明周代占卜的主要目的是祈吉、祈福，對我們理解古代占卜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啟發。

年代學是夏含夷專長的研究領域之一。自從司馬遷宣告無法得知共和元年(公元前841年)以前的紀年後，學者一直致力探索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。雖然司馬遷給予西周年代學一個可靠的基準點，但對於西周年代的確立，爭議猶存。《史記》載周厲王在位37年，下接共和

元年，後人多從之。學者一般認為，古本、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均不以共和為單獨紀年，而統入厲王的紀年內。至於近年陝西眉縣出土的一批銅器，也反映出共和不單獨紀年，可知共和確不如《史記》般作單獨紀年。因而，《史記》所載厲王在位的37年與共和的14年就不能前後相接，共和十四年(公元前828年)應上推37年。換言之，厲王即位應在公元前864至前841年，實際在位23年(即夷王在位為公元前872至前865年)。今本《竹書紀年》於孝王七年下注「是年厲王生」^⑦，並非空穴來風，由此下及共和十四年，共48年，即厲王之享壽。由於今本《竹書紀年》誤以為厲王享壽37年，故由此數減去孝王七年至夷王八年的11年及共和的14年，凡得12年，以為此即厲王的實際在位年數。要而言之，厲王紀年在共和年間並未廢止，共和原亦不是年號，後人以厲王的37年與共和的14年相接，無端多了14年，這應是導致西周紀年混亂的根源。司馬遷未能清楚處理，故只能把西周年代追至共和止。

夏含夷早年撰有〈西周朝代的絕對年代〉一文，以古文獻、青銅器等資料對每位周王的在位年期作一整理^⑧。周穆王的在位年數，自《史記》到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報告都認為是55年^⑨，在《興與象》中，夏含夷利用親簋中的主人翁親及其仕途和作冊吳盃的銘文，說明穆王在位年數不應該在40年以上

《興與象》收錄有關年代學的論文不能獨立看待，因為夏含夷近數十年的年代學研究，基本把西周年代學確定下來，已經成一家之言。夏含夷的年代學以新出土證據作科學分析，為理解中國上古年代學提供了嶄新的角度。

(頁223)。夏含夷從出土青銅器作分析而得出的這個結論相當正確。考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「穆王即位，春秋已五十矣…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」^⑫，如是則穆王享壽105歲，今本《竹書紀年》亦記載：「五十五年，〔穆〕王陟於祗宮」^⑬，是故造成千年來的誤會。但《晉書·束皙傳》引古本《竹書紀年》「自周受命，至穆王百年，非穆王壽百歲也」^⑭，這是《竹書紀年》出土時參與整理者的複述，其說可從。古本《竹書紀年》原只記穆王在位39年事，又辯及穆王壽百歲之不實，可知古本《竹書紀年》原文未有穆王在位「五十五年」之文。周初至穆王有「百年」之說，減去穆王在公元前920年前後去世計算，下延600年，大抵是公元前300年左右，故此，「五十五年」應是後人所加。古本、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均有穆王三十七年「大起九師」以「伐越」的記載^⑮。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載：「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。祭公謀父作《祈招》之詩，以止王心，王是以獲沒於祗宮。」杜預注「獲沒」指「不見篡弑」而言^⑯，即指壽終，則「伐越」為其晚年之事，穆王去世之時當發生於「伐越」不久。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又載：「三十九年，〔穆〕王會諸侯於塗山」^⑰，此可能就是為「伐越」而示威之舉，故《左傳·昭公四年》有「穆有塗山之會」^⑱的記載，確定穆王「獲沒」在此年應是合理，然則，穆王在位只有39年，這與夏含夷的結論是一致的。

《興與象》收錄有關年代學的論文不能獨立看待，因為夏含夷近數十年的年代學研究，基本把西周年代學確定下來，已經成一家之言。他曾以銅器銘文作為史料證據，復原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周王的在位年代，又以《竹書紀年》證明宣王時期曾使用兩個年曆^⑲。1996年，中國啟動的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企圖解決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學問題，結論未能得到學界普遍認可^⑳。然而，夏含夷的年代學以新出土證據作科學分析，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西周紀年，為理解中國上古年代學提供了嶄新的角度。

夏含夷對於《竹書紀年》的研究有重要的影響。他對周初史事與年代問題一直很有興趣^㉑，自從讀了顧頡剛〈武王的死及其年歲和紀元〉一文後，他以顧頡剛沒有引用的今本《竹書紀年》作比較，對照了周武王卒年的兩種記載，證明今本《竹書紀年》中出現了當時荀勗、和嶠誤置的一支四十字的錯簡。自清代以來，史學界一直認為今本《竹書紀年》為偽書，夏含夷的研究指今本《竹書紀年》不是宋代以後的偽造品，而是從西晉時代荀勗及其屬下編輯整理後直接流傳下來的文本，因為《竹書紀年》在發現以後經過兩次整理工作，兩次都留下某些痕迹。雖然如此，他仍認為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存在因流傳過程中傳抄錯誤而造成的一些問題。《興與象》收錄兩篇有關《竹書紀年》錯簡的論文，並以《水經注》和《史記索隱》引《竹書紀年》相異之引文

自清代以來，史學界一直認為今本《竹書紀年》為偽書，夏含夷的研究指今本《竹書紀年》不是宋代以後的偽造品，而是從西晉時代荀勗及其屬下編輯整理後直接流傳下來的文本。

「道可道非常道」的句逗方式，至少可有五種，揭示的意思各有不同。夏含夷的解說固然可資參考，但其方法更值得我們注意。歷代注疏家在訓釋古籍時，往往從思想哲學的層面考慮，反而忽略了語言、語法、文字的意思。

作證據，說明今本《竹書紀年》是荀勗的整理作品，並認為從整理工作留下的痕迹可以復原《竹書紀年》基本的部分原貌（頁239-69）。

事實上，學術界仍然普遍認為今本《竹書紀年》是偽書，但當一些學者發現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存在有助他們論證的證據時，卻毫不吝嗇地引用。當我們指控一則史料是偽造、虛構的時候，就必須對其偽造原因、形成偽造的過程作出分析才合理，不知道、不理解一則史料的「偽造」過程，就斷言整本書是偽書，似乎不合現代學術的標準。筆者相信夏含夷多年來對今本《竹書紀年》的研究可以改變學界對此書的定見。

《興與象》中還有數篇主題獨立的論文，可略為介紹。〈公元前1000年前後東西文明交流三則〉一文是周武王時代東西文明交流的證據，包括公元前1000年前中國的絲綢已傳到埃及，而埃及的「紙草紙」亦在中國使用。此外，該文又藉考古發現，說明西周時期有白種人在中國居住。此文說明了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，歐亞大陸的東西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來往，遠比我們想像中熱鬧。事實上，夏含夷一直關注中外古代文化交流史，他在《古史異觀》中就提到公元前1200年前後，馬車通過中亞傳入中國，而且指出商周之交正是中國車戰發生革命性改變的時代，周軍在與鬼方和玁狁的戰爭中迅速大勝，最決定性的因素就在於他們使用了新式的馬車戰法^②。如果把這些發現用來

拓寬交通史、經濟史、科學史、民族史等研究的景象，相信我們對中國上古史會有比從前更加可觀的認識。

此外，《興與象》收錄了〈非常道考〉一文，開宗明義地表明不認同前人對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的見解，指出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只是說一種恆久不變的道路不會導致行人到達目的地，任何的道路都要轉來變去以避免大自然和人為的障礙，是以「道」引伸「道理」的意思；也就是指「一個能夠滿足各個不同的時代和各個不同的環境的道路，是一個一直在演變的道路」（頁279）。從古到今的《老子》注釋、老子研究或翻譯，可謂汗牛充棟，但當中有多少可以準確詮釋《老子》，則大可存疑。「道可道非常道」的句逗方式，至少可有五種^③，揭示的意思各有不同。夏含夷的解說固然可資參考，但其方法更值得我們注意。他分析東周至漢代的解說，認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是指無法利用語言來描寫永久之道，又援引古籍例子，說明「道」為「導致」的「導」（頁282）。歷代注疏家在訓釋古籍時，往往從思想哲學的層面考慮，反而忽略了語言、語法、文字的意思。假若學者在注疏、訓釋和翻譯古籍時多從這些角度思考，說不定古籍上呈現的中國古代文化會蘊含更多姿彩。

夏含夷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超過三十年，貢獻殊多。《興與象》收錄他與魯惟一主編的《劍橋中國古

代史》中的〈序言〉中譯本，介紹了西方漢學界的中國上古史研究情況。此文在回顧有關研究外，又交代文獻及物質資料的可用性，提醒我們注意考古學對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幫助，並希望將來能有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重寫中國上古史。夏含夷所言甚是。人不惜力，地不藏金，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獻資料，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帶來空前的繁榮。在地下資料陸續出土的情況下，重寫中國上古史的條件已備，加上學林專家輩出，2010至2012年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出版十一卷《商代史》就是顯例^②。相信將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園地將會繼續有舉世矚目的成果。

夏含夷身為一位外國學者，主張外國學者與中國學者應保持互融互動，彼此都不應存在種族上的歧視，無視「非我族類」的研究成果。他認為只要能促進中國上古史研究，任何學者的發現都應得到重視，因此他提出「研古派」的想法，指無論疑古、信古，都是研究古代的學派，又或者可稱「殷古派」，即是指把古代看作豐富多彩的學派（頁315-16）。

筆者認為，無論疑古、信古，或走出疑古，中外學者都利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國上古史，努力復原古代中國的面貌。如果存在敵意攻擊，無視對方的研究成果，就只是一種學術霸權的表現，對學術發展毫無用處。中外學者或然各有其民族感情，但民族感情確不應投射到學術研究之上，在追求

神聖而崇高的求真史學時，華夏之學應含「夷」，集思廣益，相信能刺激我們反思求真的態度和方法，使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園地得以百花齊放。

註釋

①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. Shaughnessy, eds.,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: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.C.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9).

② Edward L. Shaughnessy, *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: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* (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1); *Before Confucius: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* (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7); *Ancient China: Life, Myth and Art* (London: Duncan Baird Publishers, Ltd., 2005); *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* (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6)〔中譯本為夏含夷(Edward L. Shaughnessy)著，周博群等譯：《重寫中國古代文獻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)〕；*Confucian & Taoist Wisdom: Philosophical Insights from Confucius, Mencius, Laozi, Zhuangzi, and Other Masters* (London: Duncan Baird Publishers, Ltd., 2010).

③ *I Ching (The Classic of Changes)*, trans. Edward L. Shaughnessy (New York: Ballantine Books, 1997).

④ 夏含夷：《溫故知新錄：商周文化史管見》(台北：稻禾出版社，1997)；《古史異觀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)。

夏含夷主張外國學者與中國學者應保持互融互動。無論疑古、信古，或走出疑古，中外學者都利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國上古史。在追求神聖而崇高的求真史學時，華夏之學應含「夷」。

- ⑤ 夏含夷主編：《遠方的時習——〈古代中國〉精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；夏含夷主編，《中國古文字學導論》翻譯組譯：《中國古文字學導論》（北京：中西書局，2013）。
- ⑥ Clara Wing-chung Ho, introduction to *Windows on the Chinese World: Reflections by Five Historians*, ed. Clara Wing-chung Ho (Lanham, MD: Lexington Books, 2009), 1-2.
- ⑦ 夏含夷：〈殷虛卜辭的微細斷代法：以武丁時代的一次戰役為例〉，載《古史異觀》，頁19-33。
- ⑧ 夏含夷：〈試論周原卜辭由字——兼論周代貞卜之性質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，1989年第17期，頁304-308。夏含夷的博士論文參考書目已有〈試論周原卜辭由字〉一文，只是註明是「手稿」，其博士論文中「西周時代的占卜」一節也對「由」提出了解說。參見Edward L. Shaughnessy, “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” (Ph.D. diss., Stanford University, 1983), 58-59, 361。
- ⑨⑩⑪ 王國維：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，收入方詩銘、王修齡：《古本竹書紀年輯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253；252；252。
- ⑫⑬ 夏含夷：〈西周朝代的絕對年代〉，載《古史異觀》，頁131-90。
- ⑭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，卷四，〈周本紀第四〉，頁140；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：《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-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：簡本》（北京：世界圖書出版公司，2000），頁26-27。
- ⑮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四，〈周本紀第四〉，頁134、140。
- ⑯ 房玄齡等：《晉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五十一，〈束皙傳第二十一〉，頁1432。
- ⑰ 方詩銘、王修齡：《古本竹書紀年輯證》，頁52；王國維：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，頁252。
- ⑱ 杜預注，孔穎達疏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收入阮元校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，卷四十五，〈昭公十二年〉，頁2064。
- ⑲ 杜預注，孔穎達疏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卷四十二，〈昭公四年〉，頁2035。
- ⑳ 夏含夷對「斷代工程」的意見可參見Edward L. Shaughnessy, “Chronologies of Ancient China: A Critique of the ‘Xia-Shang-Zhou Chronology’ Project”, in *Windows on the Chinese World*, 15-28。此外，2012年6月夏含夷提交中央研究院「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」的會議論文〈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十年後之批判：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〉，集中表達了他對「斷代工程」的最新意見，該論文摘要可參見中央研究院的官方網頁，<http://proj3.sinica.edu.tw/~icosas/download/ScholarSummary/267.pdf>。有些國內學者也對「斷代工程」有所保留，參見胡厚宣、胡振宇：《殷商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622-23。
- ㉑ 夏含夷：〈《文史》對我的影響，我對《文史》的印象〉，載《溫故知新錄》，頁219-20。
- ㉒ 夏含夷：〈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〉，載《古史異觀》，頁99-130。
- ㉓ 詳見李劫：《中國文化冷風景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3），頁296-98。
- ㉔ 宋鎮豪主編：《商代史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-12）。

陳嘉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
博士研究生